

公务员“不好当”是发展转型所需

近日,《新京报》就“中央禁令对公务员影响”,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的北京、黑龙江、江苏、福建、陕西等省份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全部受访者均表示受到了“禁令”影响,超九成坦言“公务员不好当”。

去年,从中央到地方各项规定、禁令不断出台,2013年也因此被公务员称为“禁令年”。从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到坚决刹住中秋国庆节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到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从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到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多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具体“禁令”,几乎涵盖了公务员们工作生活各个方面。

调查显示,全部受访者都表示中央禁令对其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之前可以收到一些购物卡、烟酒之类的礼品,2013年后却没有收到任何礼品的受访者占到了79%。有93位受访者还表示“公务员不好当”。八成以上的公务员表示八项规定后,吃喝少了,以前部门经常出去吃饭,现在几乎没有。原本单位在过年过节会发的一些生活日用品福利,2013年也全部取消。此外,禁令在执行上并未有职务地域之分,科级及以上的公务员,其收入和福利也和普通公务员受到了很大影响,东、中、西部3个不同地区的公务员生活受到影响一致。

过去一年,“为官不易、公务员不好当”,成了公务员群体共同的感受。管得越来越细,界限越来越清,惩处越来越严,形势越来越

透明,扫除了很多公务员在规定、禁令之下可以“自由游走”的灰色地带,也省去了很多企业以“泡茶”、“叙旧”之名“不得不花的钱”。

少了应酬,生活变得简单许多,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去打打球,或者回家陪家人,此前喝坏的身体也慢慢恢复了,公务员生活回归到了健康的轨道上。那些常与公务员打交道的企业负责人同样感慨,作为送礼的“主力”,他们的送礼金额大幅下降。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些“禁令”能长期发挥作用。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作为承担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务员群体当然也要转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公务员转型对社会转型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

要想保持长治久安,一个社会要想保证安定有序,一定取决于人民的生活状态。所以,公务员的转型之路看似是个人的被动变化,实则是国家的主动变化。

随着“公务员不好当”现实的普及,人们对公务员这项职业的认识也将趋于理性。在失去隐性收入后,一些公务员可能考虑离职转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让有青春、有才华、富有创新精神的人到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去,让政府更加精简,让工作更有效率,让社会更具活力。正像我们所看到和感受的那样,公务员“不好当”已经悄悄开启了公务员转型之路,既然转型不可避免,那么怎样才能转得更快、更好,当是所有公务员认真考虑的现实问题。

宋华

最近,上海市民诸先生突发急病,家人数次拨打120均被告知“没车”,而在急救车姗姗来迟后,诸先生经抢救无效去世。该市医疗急救中心急救科副科长董钧接受采访时道出隐情:“当日接线员回应‘没车’,并非指没有救护车,而是人手不够。因为在上海市人口最为密集的中心城区,仅有164名急救医生可供派遣承担急救任务,而去年一年就有近1/4的急救医生离职。”

急救医生为何“累觉不爱”?

深圳、北京、宁波等地都曾传出类似消息:急救医生留不住人,缺口大。对一个城市而言,急救资源不足是一种险情,意味着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间可能会因此被人为拉长。对某些危重病人而言,这是百分之百的坏消息,一旦延误了急救时间和入院时间,后果不堪设想。

急救医生离职者如此之多,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工作强度极大、累、风险大伴随而来的心理压力大、上升空间小、薪酬待遇偏低。近两年来,一些问题正在得以纠正。比如,因为招聘难,急救医生的薪酬待遇在悄悄得到调整,工资在涨。但从事一份职业,金钱上的尊重可能只是一方面,而非非事情的全部。

分配不公平比收入低更容易挫伤劳动积极性,让急救医生们感受不到尊重。在当前的医疗体制下,很多时候,医生收入不是看工作的医疗风险、劳动强度、技术难度,而是由销售药物、器械、检查的业务量来决定。越能够给医院创造利润的科室和医生越有地位,在收入及各种待遇上会得到最好的照顾倾斜。急救是一种亏损的医疗服务,急救医生在医疗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往往不被认可,常被误解为搬运工。

在医患关系恶化、医患信任不佳的时刻,作为医疗风险最高和矛盾最容易激化的科室,急救医生当然成为最容易流失的群体。儿科医生也一样,近来多地都有报道称政府公开招录儿科新生儿医生,报名者寥寥无几,门前冷落。

当然,还有外界“诱惑”的因素存在。随着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壮大,在市场上,医生们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到外企工作的医生越来越多,医生下海的浪潮也出现了。去年,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女超人于莺辞职,自称不愿和现行职称评判体系玩了,想做全科医生,曾引起广泛关注。但这只是医生辞职大军中的一员而已。

急救医生的大量辞职是一种抗议与博弈,会给卫生部门和医院管理者制造不小的压力。医生大量辞职会拉低服务质量,公众对急救医疗这种公共服务的不满,将很快转变成对管理者的负面评价,迫使政府不得不做出调整改变,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识大局知方向有远见的政府管理者,应该清楚地知道急救医生这种资源的重要性,防止因其不足带来的破坏性,避免险情发生。以上海为例,当地政府为解决急救医生紧缺,已经建立院前急救医师定向培养制度。培养容易,但要留住人,还要下更多的工夫。 吴帅

江苏一贪官登报忏悔:觉得当官吃亏开始收钱。“今天,我坐在这里写下这样的忏悔,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由于我的错,我30余年的奋斗历程画上了可耻的句号,一切努力和奋斗付诸东流……”这是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东镇原党委书记陆洪来所写的悔罪书中的一段。如今,他因为受贿120余万元,已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而他的悔罪书被登载在《检察日报》上。贪官忏悔录是一个固定的栏目,网上可查到的最早的稿件是2006年9月发表的。(《现代快报》)

“贪官登报忏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公开悔过书,是为了给更多的干部敲响警钟。“贪官登报忏悔”的做法从2006年坚持至今,想必有不少贪官在这个“舞台”上亮相过;他们的“现身说法”,或许也让不少官员怦然而惊,得到了警示。

不过,我觉得时至今日,曾经发挥过一定作用的“贪官登报忏悔”也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贪官落马的数量和速度都“今非昔比”。十八大以来,单是落马的省部级“大老虎”就多达19个,更别提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苍蝇”了。如果让这些贪官都来个“登报忏悔”,别说一家媒体,就是再增加几家,版面也不够用。并且这些东西看多了也有审丑疲劳,读者对类似的内容已远没有以前那么感兴趣了。更何况,某些贪官悔过时“堕落路相似、忏悔辞雷同”的现象愈来愈严重,有人甚至连悔过书都抄袭。这样的悔过,又有何大意义?

另外,“贪官悔过”这种形式本身是否真的有用,也值得商榷。或许,有的贪官确实为犯下的罪行忏悔,“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是发自内心的。然而,无数事实都告诉我们,贪官是最善于表演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忏悔很多时候并不一定完全可信。我们见识过太多贪官的“忏悔秀”:满怀“深情”自称“农民的儿子”者有之,痛哭流涕骂自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者有之,一口气写下万言悔过书者有之,作揖下跪自扇耳光者亦有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贪官们此时的卖力表演,虽然不排除有忏悔的成分,但显然也不能排除他们别有图谋、获得轻判的意图,甚至有的贪官如此表演只不过是混清视听、掩盖更大的罪行而已。

“贪官悔过”和“贪官登报忏悔”,说到底还是为了让贪官以及其他“围观者”思想上受到触动,在自省的基础上加强自律。但很多时候,自律却不一定靠得住,法律才是遏制腐败的根本。以我们的近邻韩国为例,韩国上世纪90年代前腐败问题严重,为遏制腐败,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实行公开监督制度,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公民都能参与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受监督的公职人员都会认真对待监督机构的意见建议。李明博上台后,更是将打击政府内部的以权谋私行为作为工作重心,推出“一刀切”政策:如果官员被发现受贿或贪污,无论涉案金额大小,都将开除公职……上述监督制约机制虽不一定能够保证没有一点腐败,但最起码加大了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将腐败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在廉政建设方面摸索出的有效方法,实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乔志峰

“玉石是身份的象征,集文化艺术价值、现实价值和收藏价值为一体,经常与玉接触能促进玉与人的物质交换。”说起玉石,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就顿感精神,眼睛发光。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清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的事实也浮出水面。(1月7日新华网)



养人的东西怎么就害了人

养人的东西怎么就害了人?玉,在本土文化的语境里,既是物件,也是特别的文化符号。人能养玉,玉亦能养人。

从物理性、药理学来讲,长期佩带玉石,可以保持人体内各种元素的平衡,不同的玉石有不同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养人作用并不是这些,玉之所以养人,是养人之德性,既君子之德,德性至诚者。还可以说,养玉在心,能让人宁静而致远。

但对于倪发科来讲,养玉之心不在玉,全在于利益交换,玉石比附于他的不是润泽以温,不是君子之德,而是他物欲熏心在玉石上的无限放大。

细节披露,倪发科最钟情于原石籽儿料。收藏家马未都以往的身份说,籽儿玉是过去老古玩行对新疆和田鹅卵石状玉把件的俗称,没雕过原始状态的材料叫玉籽儿。而过去玉籽儿并不值钱,与有过雕工的相比价值天壤。但是,这些年,籽儿料如咸鱼翻身,一天一个价,价格高过了玉雕件。

这不是正常现象,按马未都打的比方是:这形同面粉卖得比面包贵。材料再好也是材料,怎么会贵过玉身上附加的文化和历史呢?要知道,玉不琢不成器,鬼斧天工的雕工价值肯定大于材料的自然品质。过往的玉雕大师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怀着敬畏之心精雕细刻,创出艺术品,赋予无生命之物以生命,以撼动人心的精气神儿。

在现实语境里,不光是玩玉,像倪发科这样的人,啥东西一玩都能变成稀缺资源,本土贵在人多,只要有钱赚,蜂拥而上,马上就产生蝴蝶效应。倪发科靠让白酒疯涨,让大闸蟹疯涨,让字画疯涨,让红酒疯涨,扭曲的社会价值观让任何材料都可能疯涨。

跳出文化的层面,看这类问题就会发现,整个古玩行其实已和其他的经济投资门类趋于一致了,它们都不过是投机者资本炒作的工具而已。因此,材料贵过有文化附加的雕件就不足为怪了,而这也正是养人的东西害了人的根源之一。

今语

拔枪示警亦须理性克制

近日,两辆拉运橘子的货车先后在高速路上侧翻,闻讯而来的村民准备伺机抢橘子,负责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一度拔枪示警。现场照片显示,警察将枪口指着企图哄抢橘子的百姓。

这本是一起正常的执法事件,最后也取得了较好的结果。整个过程中,警察体现出很强的维持秩序能力。与以往一些个案中的不作为相比,该案中的警察执法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利益,且避免了哄抢可能给交通秩序带来的混乱。但是,由于执法过程中出现了拔枪行为,使得本案具有了公共讨论的空间。

现代社会,对于枪这样的执法利器,人们总是很矛盾。面对恶人凶行,我们期待警察手中的枪能够令人闻风丧胆,倘若此时警察手中无枪或是没使好,肯定会遭到社会对执法能力的质疑;但面对寻常百姓,我们又时刻对枪保持警惕,倘若警察对待无辜者以枪相向,势必遭到舆论对暴力滥用的唾骂。

必须承认枪是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只有在面对更为暴力的行为时才具有正当性,因此立法对枪支的持有、使用进行了严格规范,以确保作为执法器械的枪能够真正带来秩序,而不是对秩序的破坏。本案中,警察具有维护现场秩序的正当前提,且面临着众人哄抢的紧迫情形,其拔枪乃是执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举动,本质上属于“使用武器”的前置方式,会直接引起相对人心理上的不良感受。更关键的是,拔枪后直接指向相对人,这是一种十分冒险的行为。如果不是到了必要的紧迫地步,一般不拔枪,即便拔枪也不直接指向人,而应采取朝天鸣枪示警的方式。

之所以对使用枪支有如此多的苛求,一切都是因为枪乃夺命利器。正因如此,军事机关多规定枪口不能对人,即便膛中没有子弹,枪口对人也都构成严重的违纪并会受到严惩。

如此规定的目的,旨在保证持枪者对枪始终保持一种理性克制的态度,即使执法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不可随意妄为。一旦执法者对枪支失去了敬畏,那么出现像广西警察酒后射杀孕妇的恶性案件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虽然立法上对枪支使用有一套程序控制,但实践执法面临的往往是各种紧急状况,这需要执法者拥有客观准确而迅速的判断。这种能力的形成,在平时对武器使用的事后评估是分不开的。因此,充分激活事后报告和调查评估机制,是增加警察使用枪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必然要求。

傅达林

“把手机交出来!”日前,因故没上学的李胜在菏泽鄄城县城关镇某地准备玩手机。不料手机刚掏出就被路对面执法的城管人员追赶七八十米,将手机夺走。在争夺手机过程中,李胜被打了几个耳光,身上也被踹了几脚。而追打的原因,竟然是怀疑他在偷拍城管执法。(《齐鲁晚报》)

把孩子心爱的小手机当成了凶器,必欲夺之而后快。如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见执法中的城管有一颗多么敏感的心!

文/小强 图/春鸣

怎么放假当看国情

1月8日,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旅游绿皮书》,建议恢复五一黄金周、加长春节放假的建议,在网上被热议,几乎得到了一边倒的赞誉。

在放假问题上,大家有着相对一致的共识,那就是:优化安排时间、合理增加假期。即便也有“更重要的是推广休假制度”的声音,但这却是另一个议题,并不妨碍假期要增加,因为:推广休假制度和合理增加假期,本来就没有矛盾。

尽管有“优化安排时间、合理增加假期”的公约数,但也难以求得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当假日办发布2014年放假方案后,公众发现不仅五一黄金周没了,国人最看重的大年三十也被排除在假期之外,虽然调整至正月初七的那一天假,显然无法弥补如此大的落差,结果纷纷吐槽——在除夕的时候给假日办打电话,看看他们是不是在上班!

黄金周有没有民意基础,汹涌的旅游人潮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对于复杂的放假调休,有网友吐槽,很正常。面面俱到不可能,但与民众的对话过程中,定会找到一个如何放假的最大公约数。

诚然,假期的增加,可能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相适应”的问题,也有“减少对经济社会运行影响和冲击”的问题;对于企业,假期毕竟是一种成本,对于个人,也不一定都愿意把假期连起来。不过,这也正说明,怎样放假也需要跟国情对接。在很大程度上,即便媒体发一万篇文章,带薪休假制度在当前中国也难以真正全面推广,这同样是国情。而黄金周,即便旅游体验越来越糟糕,或许是最为简单可行的让国人有效带薪假期的方案了。如果因黄金周人满为患而取消假期调休,呼吁以年假出行,只能是把更多人困在了办公室。

近日,铁路购票网站屡屡被挤爆,再次印证春节的强大力量。当前,中国已经是一个流动着的国家,而中国仍是一个农业重生的国家。无数“为梦想、千里行”者,希望能常回家看看。在这样的情况下,黄金周不不仅是刺激消费那么简单,还能够分流春运的部分压力,对很多人是一个“安慰周”。

不管是《旅游绿皮书》,还是假日办,节假日在社会管理者眼里,似乎只跟“旅游”这个行当有关系。然而,是否安排黄金周、加长假期,可能不仅需要从刺激消费的角度加以考虑,更重要的是与国情对接、与民意合流,尽量保障公众休息、休闲的权利。 舒天烈

五粮液的豪华车队不能一拍了之

1月7日上午,即将被拍卖的宜宾五粮液集团公司、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约340辆公务车正式面向公众展示,包括悍马、辉腾、沃尔沃、奥迪在内的13辆五粮液高管坐骑全部集中亮相。

毫无疑义,五粮液拍卖公务车值得肯定,这既是在白酒业整体不景气之下,白酒企业必要的压缩成本之举,也是五粮液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响应公车改革提升形象之举。

但是,在肯定之余,而对五粮液此次拍卖的悍马、辉腾、沃尔沃、奥迪等超豪车,五粮液作为大型国企,响应公车改革提升形象之举,其背后是否隐藏着其他问题,值得思考。

事实上,在近年来屡屡曝出的国企乱花钱事件中,五粮液的“豪华车队”并非孤例。这些问题,根在目前的国资监管机制难以对国企形成有效约束。

自2003年成立国资委启动“央企重组”和“强化治理”之后,国企的经营效率和业绩是有所提高,但是在对国资增值利润的使用上,却管得太过,从而导致国企的奢侈浪费之风。

姑且不论,近十年来国企盈利能力整体提高,存在国企垄断定价能力强化、银行信贷和财政补贴过于倾斜等非市场化因素。即使承认国企高管对国企盈利能力提高所起的作用,对其进行物质奖励,提高其住房和用车待遇,也应严格遵守中央相关规定,而不能肆意妄为,进行超常的“自我肯定”和超标的“自我奖励”。

国企盈利能力的提高,不是乱花钱的理由。国企盈利能力提高了,首先应考虑提高国企红利的上缴比例,以增加公共保障性财政收入,其次还应减少对银行信贷和财政补贴的倾斜性依赖,以确保与民企市场地位的相对公平,再次是部分垄断定价能力强的国企,对国内市场竞争效率和业绩有所提升,以刺激内需和维护广大民众利益。

五粮液拍卖公车一事,不能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公车超标配上面,而应着眼于制度建设,尽快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企利润分配形成更加有效的约束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将国企红利上缴比例提高到30%。有些地方和有些国企完全可以更加积极主动,不必一定要等到2020年,也不必将上缴比例局限于30%。

当然,还有必要提醒的是,此次五粮液启动的公车改革,不仅应强化拍卖程序的公开透明,而且应确保公车拍卖后“车补”标准的合理合规,以防止将公车改革,变相演变成部分高管自我增加福利的游戏。 京文